

战争记忆与澳大利亚的亚洲观

师小芹

内容提要：在围绕澳大利亚身份认同的维度丰富的研究中，一直缺少战争记忆这个维度。本文通过回顾澳大利亚与亚洲的战争和非战争接触，探析其对亚洲的认识和对自己的认识，以增进对澳大利亚亚洲观的理解。

关键词：澳大利亚 战争记忆 亚洲观

在晚近的国际关系研究中，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国家身份像澳大利亚一样受到如此多的瞩目。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澳大利亚作为曾经的殖民前哨、发达国家、西式民主国家、白色人种为主体的国家，与近邻亚洲——前殖民地、发展中国家、非西式民主国家、有色人种为主体的国家——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种巨大的异质性，导致邻近地区成为澳大利亚自我身份认知的重要构成因素。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对亚洲的认知，变成了日常对自己的拷问：我是谁，与我的邻居有关系吗？在这种经久不断的自我拷问之中，产生了无数种从人种、人口、文化、经济等角度进行解释或者回答的作品。但有一个因素——战争，尚未得到足够的关注。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对澳大利亚的亚洲观试做分析。

战争是塑造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因素。现代很多国家的国家身份意识和认同感是通过战争塑造的，包括中国。澳大利亚前外长、前墨尔本大学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加雷斯·埃文斯（Gareth Evans）先生的一次演讲，颇能代表人们对于国家身份认同的思考。他说：“文化成就能够激发一国的自豪感，体育竞赛也足以令国民情感激动难忘。然而，战争、战争前景，和战争记忆才是国家身份认

同的核心,正是这三者一直以来塑造着、界定着国民的集体情感和自我意识。”¹如果我们想想自己的“百年西方海上入侵”认知和抗日战争如何塑造了我们对自我的认识,那么便不能不对埃文斯先生的这番话深表同意。

以此为出发点,让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与亚洲的“战争交情”。

一、不情愿的独立

澳大利亚曾经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对澳大利亚的行政和防务管理最初维持在最低程度。1877年,英国尝试成立了“西太平洋高级使团”(the Western Pacific High Commission),驻在斐济,任务是维护英国散布在周边一系列岛屿上的利益。这一试验性的殖民地政体仅仅维持到1885年,就被柏林会议²所推翻。柏林会议要求“只有有效占领才能作为承认殖民地的条件”,仅仅声称拥有是不够的,而是必须满足一些条件,以及得到其他列强的承认。柏林会议后,按照“有效占领”原则,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都相继加入了攫取太平洋岛屿的行动。1885年,德国将新几内亚置于其保护之下。在萨摩亚,英国、美国和德国甚至进行了长达八年的代理人战争。1888年,澳大利亚呼吁英国保卫英属新几内亚,澳大利亚定居者甚至愿意为此付费。

另一方面,至19世纪末,英帝国之世界扩张已近强弩之末,开始逐渐推卸对殖民地的保护责任。南非布尔战争和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崛起,使英国政府开始加快向欧洲收缩,向殖民地放权,希望殖民地能够保护自己。1901年,澳大利亚心怀忐忑地建立起联邦。与此同时,亚洲局势也在变化。1902年英日同盟形成,澳大利亚被遗弃于亚洲的恐惧进一步加深。

由于心怀恐惧,新成立的澳大利亚联邦在其第一批立法中便制订了“白澳政策”。1901年12月23日,《移民限制法案》(Immigration Restriction Act)生效,限制任何非白种移民。至1947年,仅有2.7%的人口是出生于澳大利亚、英国和爱尔兰之外的。亚裔人口由1901年的1.25%进一步缩减至0.21%。³这一政策深刻影响了澳大利亚与亚洲地区国家的关

《移民限制法案》限制任何非白种移民。在亚洲邻国中留下了“种族主义澳大利亚”的印象。这是造成澳大利亚与亚洲地区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1 Gareth Evans, “War, Peace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note address delivered to the Melbourne Festival of Ideas, Sidney Myer Asia Centre, June 15, 2011, <http://www.gevans.org/speeches/speech440.html>, 2019-07-18.

2 1884年柏林会议通过的总条约,提出了“有效占领”概念,指任何列强在西非海岸新攫取的土地,应该知会其他签字国,以便其主张得到认可。得到认可的条件是该列强足以保护现存权利,如保护自由贸易和过境。

3 National Museum Australia, *White Australia Policy*; <https://www.nma.gov.au/defining-moments/resources/white-australia-policy>, 2019-07-18. 经过漫长的变迁,直至1975年的《激进反歧视法案》,澳大利亚才最终放弃了“白澳”政策。

系，在亚洲邻国中留下了“种族主义澳大利亚”的印象。这是造成澳大利亚与亚洲地区疏离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殖民地拥有了殖民地”：澳大利亚在亚洲使命的不断扩大

英国于1906年正式将新几内亚移交给澳大利亚，澳大利亚重新将其命名为巴布亚领地（Papua Territory）。一战爆发后，日本海军占领了赤道以北的德属殖民地，将赤道以南的德国殖民地留给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澳大利亚接管了德属新几内亚，以及英属瑙鲁。一战结束后，英国坚持日本委任统治赤道以北的德国殖民地，澳新委任统治赤道以南的德国殖民地。澳大利亚被委任统治北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和北所罗门群岛，还得到对瑙鲁的行政管辖权。

“殖民地拥有了殖民地”，一方面使澳大利亚在战后的“殖民地—反帝国主义反殖民”的叙事中，由偏远无名的蛮荒之地变成了一个新的帝国主义国家；另一方面也奠定了澳大利亚与周边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的紧密关系。这是今天理解澳大利亚与亚洲、南太平洋岛国关系的重要起点。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落单的德国巡洋舰“埃姆登”号（Emden）在东南亚地区和印度洋实施袭击。澳大利亚海军第一次参战，在可可群岛战斗中摧毁了德国战舰。这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意义不同凡响：依靠自己的力量保卫自己、保卫地区和平。

1941年底珍珠港一役极大地改变了太平洋地区的形势，也改变了澳大利亚的亚洲观。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很快在西太平洋高歌猛进，于1942年2月攻陷新加坡。英军既无能力又无意愿保卫亚洲。当日军轰炸澳大利亚面向亚洲的桥头堡城市达尔文，登陆新几内亚岛和所罗门群岛时，澳大利亚突然发现自己毫无遮掩地暴露于日本海空力量的打击范围之内。虽然与其他遭受战火的国家相比，这实在是不足挂齿的小惊吓，然而在澳大利亚的安全叙事中，达尔文轰炸事件始终是一个大事件。

直到此时，澳大利亚才签署了早在1931年英国就已制定的授予澳独立权的《威斯敏斯特法》（the Statute of Westminster），开始负起保卫自己的重担，直面亚洲。澳大利亚撤回派往中东参与帝国作战的部队，一部分回本土，另一部分投入缅甸战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军在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地区、南太平洋地区作战。1944年1月21日，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签署了《堪培拉公约》。虽非军事联盟，但两个国家逐渐认识到自己在命运上的相同之处，都开始关注美国军队在西太平洋的行动及战后西太平洋形势的走向，双方合作创建了从澳大利亚至西萨摩亚和库克群岛的区域防务区，支持对南太岛国殖民地进行托管。澳新条约让英国人生气，美国人恼怒，但为澳新战后参与联合国和南太管理奠定了基础。

虽然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独自应对亚洲和太平洋变局，但通过在亚洲太平洋

战场作战，澳大利亚对亚洲的了解也增多了。澳大利亚渐渐接受了它的独特处境：既是澳大利亚人，也是英联邦成员国民，还是一个离亚洲很近的国家。

1947年，澳大利亚常备军成立，即今天的澳大利亚国防军。澳大利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组织的军队都是作为帝国一员的身份在世界舞台上行动。建立常规国防军，是澳大利亚独立身份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与此同时，1945—1947年，澳军仍然作为英联邦军队的一部分，被派驻占领日本和韩国。

朝鲜战争是澳大利亚正式提出“澳大利亚在亚洲(In Asia)”的起点。朝鲜战争爆发后，当时的澳大利亚总理罗伯特·孟席斯(Robert Menzies)持欧洲中心观，他反对军事卷入。而当时的外交部长珀西·斯宾德(Percy Spender)认为澳大利亚在亚洲拥有安全利益，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外交关系也至为重要，而澳美关系将受到朝鲜战争的直接影响。¹在斯宾德的推动下，澳大利亚与美国缔结坚固同盟，加入反共阵线。

朝鲜战争是澳大利亚对自己“位于亚洲”“核心安全利益存在于亚洲”的认知的开端。朝鲜战争之后，“澳大利亚在亚洲”开始在澳大利亚政坛和民众之中扎下根来。

朝鲜战争是澳大利亚对自己“位于亚洲”“核心安全利益存在于亚洲”的认知的开端。

三、双重前沿：“帝国前沿”与“本国前沿”

在澳大利亚建立起常备军的同时，它亦与美国结盟，从英帝国前沿变成美帝国前沿。除了跟随美国参与朝鲜战争，澳大利亚还倡议与美、新结盟。1951年，澳大利亚同新西兰、美国签署了《美澳新同盟条约》(ANZUS)。对于美国而言，它是一个联盟，以对抗共产主义在亚太地区的传播。在澳大利亚看来，它为防御日本军事复兴提供了安全保障。支持美国盟友，换取盟友支持，成为后来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南征北战的根本动因。美澳新同盟不仅是由澳大利亚外交官首先提出来，而且是澳大利亚签署的第一个不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条约，标志着澳大利亚已经转换支点，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一环。

与此同时，澳大利亚仍然致力于维护英帝国残留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并追随美国进行反共活动。1954—1961年，作为英联邦的一部分，澳军被部署至马来亚，抗击共产主义者的游击战；也被部署至印尼婆罗洲(今天加里曼丹群岛)，支持建立马来西亚国家(Malaysian nation)。1954年，澳大利亚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展示了其对亚洲事务的兴趣，以及参与反共活动的积极性。自1962年开始，澳大利亚再次出于反共考虑，以及后来支持美国盟友的考虑，派遣训练队

¹ Department of Veterans' Affairs, Australian Government, "How Was Australia Involved?" <https://anzacportal.dva.gov.au/history/conflicts/korean-war/korean-war/cold-war-and-crisis-korea/how-was-australia-involved>, 2019-07-18.

支持南越，并逐步深深卷入。由于越战历时太久，不能取胜，伤亡不小，在国内激起反战运动。1972年澳大利亚最终撤出越南。

直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澳大利亚的战略都可被称为“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ce）战略，即在英、美两帝国前沿进行防御，支持英国和美国，维持对太平洋地区的控制。在这一“前沿防御战略”中，澳大利亚的战略是作为英国或者美国组建的同盟军队的一部分，总体上发挥着强大盟国的分战略的作用。因而，彼时的前沿指的是帝国的全球性前沿，是英、美大国全球战略和利益的前沿，并不必然与澳大利亚的地理位置和利益重叠一致。这一战略的最重要的使命是维系与孟席斯所谓的“伟大、强大的朋友”——英国、美国的关系。

“保卫澳大利亚”（Defence of Australia）与“在近邻地区做领导国家”（Immediate Neighborhood Leading Country）是“双重前沿”时期澳大利亚与亚洲关系的特点。1976年，马尔科姆·弗瑞泽（Malcolm Fraser）领导的联合政府发布了澳大利亚第一部国防白皮书，宣布澳大利亚的新政策将聚焦于保卫国家，并在邻近地区采取有限的行动。这被称为“保卫澳大利亚”政策，该政策强调“独立自主”，减少对英美的依赖，减少卷入对外军事行动，仅在本土受到常规威胁时奋起自卫。

更强大的自卫能力，与北方朋友的更紧密的合作，是独立国防政策的两大支柱。其中，澳大利亚在本地区采取有限的军事行动值得关注。澳大利亚这一时期的独立军事行动聚焦于西南太平洋和亚太地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在地区安全稳定方面积极主动，参与或领导了多项维和行动/非战争行动。1994年10月，澳大利亚展开其第一次干预行动，为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与叛乱的布干维尔革命军（Bougainville Revolutionary Army，BRA）之间举行的会议提供安全保障。1997年，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从英国商人那里招募了雇佣军，进攻叛军。结果行动失败，巴军政变，政府垮台。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随后出兵干预。1998—2003年间，澳大利亚在多国和平督查团（multinational Peace Monitoring Group）中发挥了领导作用。1999—2000年，澳大利亚负责指挥东帝汶的国际部队。2003—2017年，澳大利亚还领导了所罗门群岛地区援助使团。

除了军事介入，澳大利亚也向南太平洋至东南亚地区邻国提供军事教育和训练，作为与地区建立联系、发挥影响力的一种方式。一位不具名的澳大利亚国防部国际事务局参谋称之为“聪明质押”（smart pledge）。¹ 澳大利亚关于其维和行动的官方历史将其在南太地区的维和看作是“睦邻”政策。²

1 Tomoaki Honda, "Utilization of International Peace Cooperation Activities: Referring to Australian Initiatives," The Canon Institute for Global Studies, https://www.canon-igs.org/en/column/security/20190417_5746.html, 2019-04-27.

2 Bob Breen, *The Good Neighbour: Australian Peace Support Operations in the Pacific Islands 1980-200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澳大利亚在亚洲太平洋地区非战争军事行动参与的增多,必然加深澳大利亚对亚洲的联系和认识。在这一时期,澳大利亚于1973年抛弃“白澳”政策,也为它与亚太地区建立新的关系扫清了一个重大障碍。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澳大利亚政府格外关注与邻近国家建立更紧密的防务合作网络。

另外,澳大利亚在2013年修订了授勋标准,承认战争的性质在发生变化,非战争行动牺牲的男女军人,包括维和行动和人道主义行动,也可以授予勋章。2017年9月,是澳大利亚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70周年。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树立起70年维和行动专属展墙。这一举动也说明澳大利亚参与亚太地区的军事行动样式也正在发生变化。¹

强调保卫澳大利亚的独立国防、强调在近邻地区发挥领导大国作用的时期,也正是澳大利亚政治上强调其“中等大国”身份的时期。20世纪90年代前半期,霍克政府和基廷政府倡议“中等大国”外交。1996年后上台的工党政府民族主义和地区主义意识较重,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积极进取。²此后的陆克文和吉拉德工党政府也强调“中等大国”概念,并努力将这个外交理念与亚太地区主义结合起来,期望通过推进亚太地区主义的发展来实施澳大利亚的“中等大国”外交。³

中等大国外交、倡导地区主义、积极在地区维和行动中发挥领导作用,是澳大利亚自我利益觉醒的标志。它的自我利益越清晰、独立,它与亚洲的关系就越紧密。至吉拉德政府2012年发布《澳大利亚的亚洲世纪》白皮书时,⁴澳大利亚的亚洲观达到了积极、乐观的顶峰。吉拉德总理说:在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次,亚洲不再是对其高技能、高薪水生活道路的威胁,而是澳大利亚能够维持这一生活方式的原因。⁵

以《澳大利亚的亚洲世纪》白皮书为标志,以冷战结束后西方世界高涨的安全感为背景,澳大利亚的亚洲观一度洒满了玫瑰色,从“转向亚洲”到迎接“亚洲世纪到来”,外交政策中出现急速转变的趋势。但在身份认同的问题上,并没有这么快速的转变。过于玫瑰色的亚洲观和自我定位,反而在国内引起了反弹。

最明显的一个反弹症状就是国内突然出现一股“别提亚洲,我们的身份来自

1 澳大利亚对联合国框架下行动的认同的另一面是其曾经的帝国认同和同盟认同的重要新增维度。澳大利亚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第四大出资国,并前后派出8万人参加了62项联合国维和行动。

2 Derek McDougall, "Australia's Peacekeeping Rol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4, No. 3, December 2002, pp. 590-608.

3 Thomas Wilkins, "Australia and Middle Power Approaches to Asia Pacific Regionalism,"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2, No. 1, 2017,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ref/10.1080/10361146.2016.1238870?scroll=top>, 2019-05-11.

4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Australia in the Asian Century (White Paper)*,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australia_in_the_asian_century_white_paper.pdf, 2019-08-13.

5 "PM Julia Gillard Launches Asia Policy Blueprint," *news.com.au*, October 28, 2012, <https://www.news.com.au/national/pm-launches-asia-policy-blueprint/news-story/650b620e08310564e39ab9f6820dd68e>, 2009-08-13.

别处”的潮流，典型症状是“澳新军团精神”迷思的出现。

四、亚洲认同的反动：“澳新军团精神”的迷思

澳大利亚退役军人事务部官网是如此介绍“澳新军团日”的纪念活动的。1915年4月25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军团（简称“澳新军团”，ANZAC）作为英帝国军的一部分赴欧洲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岛实施两栖登陆作战行动。加里波利战役旷日持久，死伤惨重，澳军死伤25000人。1916年澳举行第一次周年纪念活动，4月25日被定为官方纪念日。至20世纪20年代，纪念活动在全澳洲展开，各州都将该纪念日定为公共假日。20世纪60和70年代，在对越南战争反思的背景下，参与纪念的人数下降。20世纪90年代，该纪念日复兴，特别得到年轻一代的热情参与，甚至出现前往加里波利半岛朝圣之旅。“澳新军团日”渐变成一个特定词汇，并创造了一种精神。¹

2015年，笔者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学习时恰逢加里波利战役100周年。4月25日日出时分，12万人在初冬的严寒中涌到战争纪念馆前，参加“黎明仪式”（Dawn Service）。仪式庄严肃穆，诵读前线将士的家书，将他们的照片投影在纪念馆建筑的外墙上。当天参加活动的人数相当于整个堪培拉常住居民数的三分之一。²当年作为一名现役军人，亲眼目睹战争叙事在澳大利亚人日常生活中的力量 and 影响，笔者曾经深受触动。

对于崇尚牺牲、热血、为国尽忠的“澳新军团精神”在澳大利亚国家叙事中的兴起，玛丽恩·莱克（Marlene Lake）和亨利·雷诺兹（Henry Reynolds）两位教授在其颇具争议的作品——《澳新军团精神出了什么问题》（*What's Wrong with ANZAC?*）一书中提出严厉批评，认为这是在神化战争精神。³莱克和雷诺兹教授在这本书中梳理了澳大利亚国家叙事的变迁，反思“为什么我们在澳新军团一事上如此情绪化？”质疑“国家真的是在战争中缔造的吗？”追问“澳新军团日是如何变成国庆日的？”她们认为作为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澳大利亚的民族精神气质应该是“追求经济、社会、性别和种族平等”，而不是“用帝国主义的、大男子主义的军事事件来定义自己”。

1 关于“澳新军团日”的历史，可参见澳大利亚退伍军人事务部的官网：<https://www.dva.gov.au/commemorations-memorials-and-war-graves/commemorations-and-anniversaries/anzac-day-history>，2019年7月18日登录。

2 Daniel Hurst, “We’ve Done Them Proud’: Huge Anzac Day Turnout at Australian War Memorial,” *The Guardian*, April 24, 2015, <https://www.theguardian.com/news/2015/apr/25/weve-done-them-proud-huge-anzac-day-turnout-at-australian-war-memorial>, 2019-07-18.

3 Marilyn Lake and Henry Reynolds, *What's Wrong with ANZAC? The Militarisation of Australian History*, Sydney: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Press Ltd., 2010.

两位教授在该书中还批评了“澳新军团精神”塑造过程中的“架空”趋势。认为这抽离了澳新军团的成败得失,只保留了“为国献身”的热血奉献精神;抽离了战争的性质,只强调被称为“挖掘者”(digger)的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年轻农民和牧民倒在泥泞之中的悲情;抽离了国际关系,忽略“为了什么而战?”这个根本问题,回避思考澳大利亚如何塑造国际关系。两位批评者认为,这里面蕴含着过度歌颂战争行为本身的倾向。

笔者以为,之所以“澳新军团精神”渐成为界定澳大利亚国民精神和国家身份认同的主要因素,是因为澳大利亚界定自己的道路曲折,且不断出现令人苦恼的新挑战。¹而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澳大利亚急促地摆向“亚洲身份”可算作持续不断出现的众多烦恼之一。在保罗·基廷时代,为迎合其“亚洲为中心”的外交议程,甚至提出当代澳大利亚的形象不是在加里波利形成的,而是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丛林和南太平洋的海浪中形成的。结果是澳大利亚国内出现是否“亚洲化”的讨论,激起许多反对声音。²“澳新军团精神”迷思的出现,是一个提醒:让澳大利亚人把自己想象成是置身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丛林中的和平战士,远远没有在欧洲边缘的战壕里悲壮死去的形象更容易让人认可,这也从侧面折射出澳大利亚对于亚洲的复杂情绪。

五、印太前沿:新的前沿与新的澳亚关系

随着近年来“印太”概念和战略变成现实,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再次来到一个转折点。最近,澳大利亚《战略家》(*Strategist*)杂志发表了马尔科姆·戴维斯(Malcolm Davis)的系列文章,³提出“前沿纵深防御”(forward defence in depth)主张。戴维斯认为,前沿纵深防御对于更广阔的澳大利亚海洋安全需求是必要的,澳大利亚需要改变战略态势。为此,他建议在澳洲北领地⁴达尔文建立海岸警卫队学院,联络地区国家,向北方的中国表达捍卫主权的意志。

戴维斯提出的“前沿纵深防御”并非全新的战略思想。它是以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前沿防御”为出发点的。但新的“前沿纵深防御”思想与20世纪70

1 Bruce R. Vaughn, "Australia's Strategic Identity Post-September 11 in Context: Implications for the War Against Terror in Southeast Asia,"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 26, No. 1, April 2004, pp. 94-115.

2 Andrew Guild, "Resistance to Asianisation," in *Australia's Peril: National Suicide and the Asianisation of Australia*, <http://www.ironbarkresources.com/asia/asia114.htm>, quoted from Baogang He, "The Awkwardness of Australian Engagement with Asia: the Dilemma of Australian Idea of Regionalism," http://www.ritsumei.ac.jp/acd/re/k-rsc/hss/book/pdf/vol05_05.pdf, 2019-07-22.

3 Malcolm Davis, "Forward Defence in Depth for Australia," 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June 12, 2019, <https://www.aspi.org.au/report/forward-defence-depth-australia>, 2019-07-23.

4 在澳大利亚,各领地与各州都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制定法律的权利,但领地的法律可被联邦宪法否决,不享有完全的州权。

年代的“前沿防御”战略的最大不同是，它是立足于澳大利亚的，是从澳大利亚北望看到的前沿，是澳大利亚自己的前沿。澳大利亚的主体性在此显得更为突出。

谈到澳大利亚的主体性，这里要强调的是，绝不能忽视澳大利亚战略思想界的创新能力。像美澳新同盟一样，“印太”概念也是澳大利亚学者首先提出来的，后历经数年讨论终被美国和其他几个大国接受。¹ 在2013年的《国防白皮书》² 中，“印太地区”这个概念首次被澳大利亚官方采纳，用来分析其战略环境。2016年《澳大利亚国防白皮书》和2017年《外交政策白皮书》里，继续沿用了这个概念，使“印太”最终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现实中的核心分析框架。2019年6月，美国发布了《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报告》（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³ 标志着这一概念、框架经过数年酝酿、播散、辩论，最终被决策者采用。

澳大利亚卓有影响力的智库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的执行主任彼得·杰宁斯（Peter Jennings）认为，在《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报告》中，美国将中国定位为“竞争者”，并指中国有可能在冲突爆发之初占据上风，但这给澳大利亚敞开了大门，因为美国必将对其在印太地区的整个态势进行调整。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澳大利亚的战略位置可为美国提供帮助。澳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认清现实，大胆担负起领导南太岛国的责任，

在印太框架之下，澳大利亚终于迎来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高光时刻。无论从东到西，还是从南到北，澳大利亚都是整个结构的一根主要支柱。

欢迎美国更多在澳驻军，加强澳军建设，并为印尼、越南、马来西亚等国的国防建设提供协助。⁴

杰宁斯先生一语道尽澳大利亚在新地缘政治框架下的战略价值和政治价值。在印太框架之下，澳大利亚终于迎来了它在世界舞台上的高光时刻。牢牢屹立在地球南部中心，印度洋和太平洋是它的两翼，一襟抱尽印度、东南亚、中国和日本。无论从东到西，还是从南到北，澳大利亚都是整个结构的一根主要支柱。特别是距离亚洲最近的澳大利亚北部，

1 Rory Medcalf, “Pivoting The Map: Australia’s Indo-Pacific System,” Centre of Gravity series paper No.1, November 2012, https://www.files.ethz.ch/isn/175987/COG1_Medcalf_Indo-Pacific.pdf, 2019-08-13.

2 Depart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 *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docs/WP_2013_web.pdf, 2019-08-12.

3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Preparedness, Partnerships, and Promoting a Networked Region*, June 1, 2019,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Jul/01/2002152311/-1/-1/1/DEPARTMENT-OF-DEFENSE-INDO-PACIFIC-STRATEGY-REPORT-2019.PDF>, 2019-08-12.

4 Peter Jennings, “America’s New Asia Strategy Opens Doors for Australia,” *The Strategist*, Australia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June 22, 2019. <https://www.aspistrategist.org.au/americas-new-asia-strategy-opens-doors-for-australia/>, 2019-07-16.

作为印度—太平洋门户的战略位置格外突出。¹ 在“亚洲再平衡”战略下，美国在达尔文轮换部署2500名陆战队员。在新形成的印太框架下，各种传言正在揭示未来的动向。例如，近来坊间传言澳大利亚将在达尔文港东北方40公里处修建海军设施，以供接待美国大型两栖战舰。² 另外一则被否认的传言是美国可能在达尔文部署中程弹道导弹。³ 各种迹象显示，在印太框架下，澳大利亚与美国的关系将首先进入新阶段。

那么，在整个战略图景的广度、宽度和深度，所有战略问题和战略关系都会做出调整的印太框架下，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将是什么样子呢？

这里要再次简要回溯澳大利亚的战略特点与“澳大利亚式战争”的特点。澳大利亚是个大岛，体型巨大，难以进攻。这三大特点隐含在关于澳大利亚战略的每一次讨论之中。⁴ 相应地，澳大利亚拥有25760公里的海岸线，1000万平方公里的专属经济区（世界第三大），负责5300万平方公里的海上搜索救援区。这是滋养澳大利亚战略的自然环境。⁵ 2016年，澳大利亚确定至2020年将国防开支固定在GDP的2%，并大幅增建海军力量，例如潜艇部队将翻一番。

因而，从位于大洋中的岛屿的认知出发，一方面澳大利亚人觉得自己十分安全，处于易守难攻之地；另一方面当澳大利亚人骄傲地谈论自己参与了20世纪几乎所有重大战争时，他们谈论的都是通过海洋到另外一个大陆去作战，澳大利亚参加的陆上作战，远远多于它参加的海洋作战。因此，从军事样式的角度看，澳大利亚历次海外征战的特点是以大陆为中心和以同盟为中心的。

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印太框架下的地区是一个以海洋空间为重心的地区，它是亚洲柔软的海洋腹部，其海洋特征显而易见。澳大利亚会从陆地中心转向海洋中心吗？这又将对澳大利亚的亚洲地区观产生什么影响？这两个问题都还需要时间来展开。但澳大利亚国防学院唯一常驻教授迈克·埃文斯（Michael Evans）警告说，随着澳大利亚转向亚洲，澳大利亚国防方面的上述两个特点可能成为它的障碍。因为那是根深蒂固的大陆思维，与海洋性的观念所要求的连接

1 关于澳大利亚的战略地理位置的详尽分析，参见 Jim Thomas, Zack Cooper, and Iskander Rehman, *Gateway to the Indo-Pacific: Australian Defense Strategy and the Future of the Australia-U.S. Alliance*, Centre for Security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November 9, 2013, <https://csbaonline.org/research/publications/gateway-to-the-indo-pacific-australian-defense-strategy-and-the-future-of-t>, 2019年8月12日登录。

2 Andrew Greene, “Secret Plans for New Port Outside Darwin to Accommodate Visiting US Marines,” *ABC News*, June 23, 2019, <https://www.abc.net.au/news/2019-06-23/navy-port-us-darwin-glyde-point-gunn-marines-gunn-military/11222606>, 2019-08-12.

3 “Govt Not Contemplating Missile Base in Darwin: PM,” *Skynews*, https://www.skynews.com.au/details/_6068124703001, 2019-08-12.

4 Richard Hill, “Medium Power Strategy Revisited,” Sea Power Centre-Australia, Working paper No.3, 2000, https://www.navy.gov.a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Working_Paper_3.pdf, 2019-08-12.

5 Alan Bloomfield and Shirley V. Scott, “Australia’s Maritime Strategy,” in Howard M. Hensel and Amit Gupta, eds., *Naval Powers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the Western Pacifi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pp. 138-153.

联通、向外开放特别是向亚洲开放相反。¹

目前来看，澳大利亚向海洋国家、亚洲或者印太转向，有了一些新的迹象。继2016年的国防白皮书之后，2017年10月，时任国防部长佩恩（Marise Payne）在演讲中表示，如果21世纪是亚洲世纪，那它也将是一个海洋世纪。全球经济和军事均衡正向亚洲转移，重心将在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这一水域既拥挤又竞争激烈，还是澳大利亚的后院，澳大利亚必须为此做好准备。但她也认为，在未来数十年内，澳大利亚都不太可能面临来自海上的大规模的常规军事威胁。² 那么，澳大利亚将如何在“既拥挤又竞争激烈”的自家后院行事？

2017年，澳大利亚开始实施其史上最大规模的年度海上国际接触行动——“印度洋—太平洋奋进”行动。迄今已经3年，可供分析澳大利亚在印太框架下的战略态势。这一行动2017年的重心是东南亚，澳大利亚舰队访问了文莱、柬埔寨、密克罗尼西亚、印度、印度尼西亚、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东帝汶等地区国家；2018年聚焦于南太平洋，对斐济、瓦努阿图、汤加、萨摩亚、所罗门群岛和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访问或者联合演习，执行澳政府“向前一步”政策以及作为对中国的警惕回应。2019年访问和参加联合演习的国家有斯里兰卡、印度、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

这一演习的首要使命是增进与该地区伙伴的关系，在印太地区塑造和宣扬澳大利亚的地区政策。这一取向固然是亚洲国家为中心的，但这种有意无意地假当中国不存在的做法本身也传递出某种信号。澳大利亚有人认为，如果澳大利亚必须在经济繁荣（中国）与安全（美国）之间做选择，澳大利亚会选安全（美国）。³ 显然，印太框架下的澳大利亚与亚洲的关系绝不仅仅是看上去非常亲善的港口访问和联合演习，它必将有对抗、甚至是暴力的一面。

结 语

虽然印太框架第一次让澳大利亚的前沿与“帝国前沿”基本一致了，但在享受印太框架带来的利好的同时，应对印太框架的结构性挑战，在美国与亚洲之间折冲樽俎，并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大约60年前，著名的美国学者乔治·莫德尔斯基（George Modelski）就指出：澳大利亚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它需要大国的

1 Michael Evans, “The Third Way: Towards an Australian Maritime Strateg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May 2014, https://www.army.gov.au/sites/g/files/net1846/f/thethirdway_evans.pdf, 2019-04-27.

2 Marise Payne, “Speech—Seapower Conference,” delivered on October 3, 2017, <https://www.minister.defence.gov.au/minister/marise-payne/speeches/speech-seapower-conference>, 2019-08-13.

3 Jacob Greber and Michael Smith, “Between China and US, Australia ‘will choose its security’,” *Financial Review*, March 5, 2019, <https://www.afr.com/business-summit/between-china-and-us-australia-will-choose-its-security-20190305-h1c0fo>, 2019-08-15.

保护；它又是如此强大，以至于足以在任何联合行动中成为有效的资产。¹ 澳大利亚将以何种价值在印太框架下被地区国家所衡量，澳大利亚又将如何衡量地区国家的价值，我们还需继续观察。

¹ George Modelski, "Australia and SEAT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14, No. 3, Summer 1960, pp. 429-437.